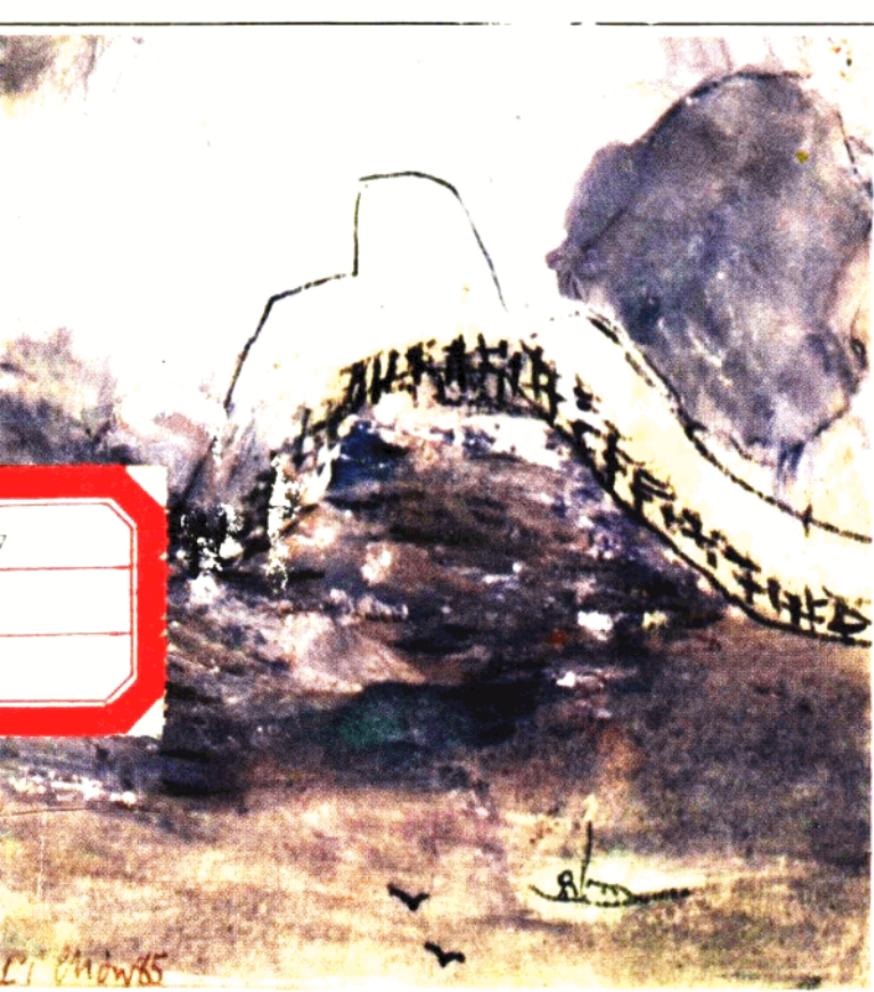


百叶丛书

· 百叶丛书 · 百叶丛书

海外心声

周仲铮



Li Zhou 65



作者简介

周仲铮女士是西德华人，作家兼画家。她的自传体小说《小舟》，一度列为西德的畅销书，曾译成五种文字出版。她的画在欧洲许多城市展出，并多次获金质、银质奖。

目 录

一曲凯歌(代序) (1)

人物篇

- 1 我的小传 (4)
- 2 南开大学母校 (9)
- 3 海外游子怀慈母 (19)
- 4 我与女星社 (26)
- 5 南开大学住校生活 (32)
- 6 张伯苓校长过巴黎 (39)
- 7 三位同胞来波恩 (42)
- 8 欢迎安致远大使 (44)
- 9 在波恩欢迎祖国亲人 (46)
- 10 一张照片的回忆 (49)
- 11 纪念张伯苓校长 (54)
- 12 我守过孙中山的灵 (57)

艺术篇

- 1 我是怎样成为一个画家的 (60)
- 2 九十只鸟 祝寿 (68)
- 3 七君子之一 (70)
- 4 最后的一晤——潘玉良在巴黎 (72)
- 5 张大千一九六一年在巴黎 (76)
- 6 张大千一九六四年在哥伦 (80)
- 7 画被选入年历 (85)
- 8 心向渤海悼念叔韬三哥 (87)
- 9 写在《小舟》之后 (91)

风情篇

- 1 天津十日游 (93)
- 2 两次故乡行 (110)
- 3 波恩的“中国夜” (112)
- 4 一日“祖国行” (114)
- 5 一枝玫瑰 (116)
- 6 我的生日 (118)
- 7 雨水如泪水 (120)
- 8 悠悠莱茵河 (122)
- 9 呕气 (124)

10	复活节的天气	(126)
11	巴黎五日行	(128)
12	德国大选日	(131)
13	天不抬头。云不抬头 春不抬头，人不抬头	(133)
14	难产的饺子	(135)
15	在波恩过春节	(137)
16	送葬	(139)
17	雪年	(142)
18	参观中国大使馆	(146)
19	波恩的中国大使馆与我	(151)

一曲凯歌（代序）

谌小岑

天津“五四”运动革命成果之一在于促进妇女解放运动之开展。周仲德的事迹就是其中明显的例证。

1924年4月，三个“觉悟社”社员邓颖超、李峙山、和我发起组织了一个《女星社》，并邀请社友王贞儒。《新民意报》副刊编辑赵景深、顾峻霄和达仁女校教员、女师、高工、法政、北洋的十几个同学参加各项活动。

《女星社》的主要工作为借用《新民意报》副刊篇幅出版一份“女星”旬刊，讨论妇女问题，还创办了一所“女星成年妇女补习学校”，由邓颖超、李峙山分别担任编辑和校长。

女星成年妇女补习学校的三十多个学生以及她们的亲属，有不少人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家庭问题。

我们用个别谈话和到她们家庭访问的方式帮助解决，并在“女星”旬刊上发出号召，我们愿意对那些正受着封建宗法礼教束缚的妇女进行援助。

当时只有十五岁的周仲铮响应了这一号召，写了信。在李峙山的帮助下，她被救出来了。她的奋斗得到了她家里叔婶的同情，取得了胜利，她那顽固的父亲终于被迫同意她入学、留学外国，她如今已成为一个国际上有名的画家和散文作家。

后来我们才知道她是两广总督周馥的孙女，也是曾任北京政府财政部长周学熙的侄女，是天津有名的宦大家的一位千金小姐。在我们同她的交谈中，发现她是一个才智兼备、能诗善画有抱负的女青年，1924年邀请她参加《妇女日报》的出版工作。

她的胜利等于向被封建礼教宗法笼罩着的天津社会投掷了一支锋利的标枪。

六十多年过去了，周仲铮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

她的胜利是时代所给予的，也是她本人的奋斗精神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她的自传《小舟》（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象征中国的妇女解放运

动中一曲胜利的凯歌，是值得全世界青年妇女学习的史诗。这本“海外心声”是她在海外的可歌可泣的心声。

1985年5月于北京

我的小传

我家原籍皖南至德，（今名东至县）前名建德或秋浦。母亲原籍江苏扬州。我出生于福建延平，当时外祖父任延平道，我母亲回娘家就生了我。祖父给我起名叫莲荃。我吃的是福建乳母的奶，同我一个表姐分吃。后来母亲常说：“你们两个吃一人的奶，为什么你表姐那样安静，你那样不安静呢？”我不到一岁就断奶了，随父母去武昌；我开始能记事，便是在武昌。我记得我父亲同我哥哥都留着大辫子，每天有佣人给他们梳辫子。我最爱的是我家宅后东湖的荷花，附近龟山吹来的喇叭声，我一生都忘不了！

大约我五六岁时，辛亥革命在武昌起义。我听父母在议论：“走呢，还是不走呢？”这时我幼小的心灵，曾激起了第一次波动。走，走到哪里去？我最舍不得的是那一湖的荷花，和小菜园将要熟的

茄子。其实，我不想走。可是，一天傍晚，父母说非走不可了，革命军已临近了武昌城。父亲是在武昌做官，他不参加革命，只有走的一条路了。

我们走的是水路。我隐隐约约记得，我们一家七个人，同抱着我四弟的顾妈，黑夜里奔走在大街上，要赶到码头去乘渡船。一个裹足的母亲，带着两个裹足的女儿，也不知摔了多少跤，终于上了船。船到江心，船夫要加价，否则就不摇，为了逃离，只得任他加价。

我还不懂，这就是满清王朝的末日！

我们家由武昌迁到了上海，我第一次见到了祖父。祖父是由贫农起家，读过书，写一笔好字、好文章。他在村中为农民写信。有一天，李鸿章发现了他，留他去做他的文牍，最后升到山东巡抚、两广、两江总督。他一生著书十余册。

两年后，我家又从上海迁到天津，因为父亲当上了民国国会议员。后来他弃了官，从事实业。

我在家跟老师学习，读的无非是《女儿经》、《烈女传》之类的书。我们家，礼教森严，父母希望子女文质彬彬，对于我这样一个爱说、爱笑、爱哭、爱闹的女子，都不符合他们的模式，不是她们心

中的“女子好模范”。

“五四”运动开始后，我已长成少女了。听到外边在搞什么爱国运动，妇女解放运动，我要求进学校读书，父母没有允许，我只得私下订了一份天津的《新民意报》，偷着看。终于我在《新民意报》的支持和进步青年的帮助下，向家庭奋斗，奔向了社会。父亲也终于答应了我上学自由和婚姻自由的条件。这时我在外边认识了李大钊、许广平和邓大姐（即邓颖超同志）。我自己起个名子叫“仲铮”。我先入北洋女子师范，后入南开大学，都未毕业，就到法国巴黎去了。三年后，我成为巴黎政治大学第一个中国女大学毕业生，七年后，获得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学位。

我出国是为爱国，为救国，为国家找出路，要把我国造成独立、强大的国家。可是我只身远离故国，异邦异言，究竟毅力不足，终于爱上了一位同胞同学，但由于某种原因又离弃了，最后同一位德国汉学家结了婚。此后，我在荷兰莱顿汉学研究院当了三年助教，战时来到柏林，先过了五年地下室生活，真正是九死一生。战后当过柏林华侨学校校长，最高的报酬是每天能在中国一个军事代表团吃

顿午饭。

1951年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走上了艺术之路，以讲演的收入抵销在汉堡艺术学校的学习费。三十年来我作过数百次有关中国文化问题的演讲，开过无数次画展，得到过国际金质和银质奖章。

我先后用德文写了六本书，第一本取名《小舟》，有英、法、意、荷等国文字译本；第二本叫《十年幸福》，都是自传。为什么写自传？有什么值得可写的呢？我是一个在奋斗途中跌倒的女子，对祖国没有一点贡献。所谓自传，也不过是自悔而已。悔，不是悔的向旧社会奋斗，而是悔的对祖国无所贡献。

1978年和1980年，我同我的爱人两次回国观光、探亲。我非常高兴，我能亲眼看到祖国的新生和伟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的国家了。“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这是毛主席说的话，真对极了！我看到我的同胞，男女老少都站起来了，都大踏步向前，高歌猛进！中国的前途是光明伟大的，中国人民一个个努力前进，中国还会不强大吗？

我爱人是极爱中国的德国人，他荣幸地在中国感到了中国人民的温暖，特别是我的家人对他的温暖。我们俩要以残年为国家尽点力。

我把重过乌鲁木齐时写下的几句诗，作为结语吧：

祖国呀！——

我爱你的山川奇秀，

我爱你的云彩美丽，

我爱你的人民谦虚，

我要使你的山川更加奇秀，

我要使你的云彩更加美丽，

我要使你的人民更幸福更自豪！

我可爱的祖国呀——

我怎么能不爱你？

(原载安徽《艺谭》1982年第一期)

南开大学母校

我没有进过小学，也进入中学了，我没有读完中学，也进入南开大学了。是什么缘故呢？我出生于一个封建守旧的家庭，所受的教育，是三从四德。在家同兄弟们进书房，同老师学习。读的是《列女传》，《女孝经》。逢年过节要在圣先师孔夫子像前叩头。到了十五岁，父亲说按《礼记》，男女不可授手了，书房我也不可能进了。只得同一位请来我家的妇人学绣花。一针上，一针下，针针绣得我心花怒放，针针绣出我脱离家庭的念头。不要做闺秀，要做奋斗者。要到外边去，要到外国去，要吸取外边的空气，要吸收外国的空气。那时外边的空气，是“五四”运动高潮；外国的空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方休，日本强迫我国承认二十一条。

我私下得到了外边爱国志士的支持，脱离了家庭。第一次跑到北京，也认识了李大钊。由于天津

《新民意报》的支持，在报上同父亲订了条件：有求学自由，婚姻自由后，才回家来。后来父亲就送我到北洋女子师范考试。反正我的名字周仲铮是我自己起的，在报纸上也闹过一番，考试只是个形式。那位校长虽然不一定以我为然，但也只得收下我当初级的学生。我进了学校，先是走读。我不满意，要求父亲让我住校。住了校我在功课之外，就作救国运动。那时也认识了许广平和邓大姐。

我在校的成绩不坏，就感到在此校学习满足不了我。那时天津出名的一个好中学，就是南开中学，可是不收女生。“岂有此理！男女不平等！要向南开校长张伯苓请愿！要求他办南开女子中学！”这是我的号召，我就写了请愿书。在我校请同学签名，到中西女学去请学生签名。结果有十二个大胆的青少年在我请愿书上签了名。我们把请愿书寄给张伯苓，果然有了回音。他要我们派几个代表，约定于某日某时到学校去见他。

好不高兴啊！可是一鼓作气的我，想到真的要和大名鼎鼎的张伯苓校长见面，就有点害怕了，怕说不出话来。于是我们在十二人中推了四人做代表，于四人中又推了一位年过二十，见过世面，敢

说话的广东黄女士作为发言人。那时，张伯苓一见我们就说，“你们不要以为见到大人物就害怕，不用怕。有话都说出来。”他那魁伟的身材，却使我们几个青少年有点害怕。黄女士果然能开口，把我们的来意说明了。张伯苓继续问：“这请愿书是谁写的？”我心中一跳，坏了，坏了，好象是要捉凶手似的，凶手就是我。黄女士指着我说：“是她写的，她是周仲铮。”我心跳起来了。张伯苓忽然说：“写的很好，很好！你们要我办女中，你们有钱吗？”这个钱的问题，当然我们没去想，也不知道如何答复。张伯苓笑起来说：“没有钱，教我怎样办女中呀！”我们都鸦雀无声。还是黄女士有经验，她说：“张校长你可以募捐吧，到美国去募捐。”张伯苓又笑起来说：“募捐是容易的事吗？”但他答应尽力去做。最后我看他也有点高兴，也有点自豪。我们不求别人，而求他来办女中。

我们告别时，看来一点希望也没有。我既不满意女师范，又不愿进教会办的中西女学，怎么办呢？那时张伯苓已开办了南开大学，并且是全国第一次大学招收女生。我心想只有进南大了。我有什么资格进南大呢？一点资格没有。可是我向父亲说

了。他不懂我为什么要进学校，又不懂我为什么又不满意学校。他说我好高骛远，不安本分。可是父亲终于说了：“南开创办人有个严范孙，是我认识的，我只有向他，有没有办法。”果然有办法，可以当旁听生，学费加倍。

那时南大课室还在南开中学区一所房子里。女同学只有四位，一位是我的姐姐，一位是许桂英，一位是黎元洪总统的女公子。许桂英非常洋化，高跟鞋，烫发头。黎女公子是显贵化，寡言少欢。我看她们都做不上朋友，都不是我的同志。

由于没有校舍，黎女公子坐汽车来听课，我坐马车来听课。没有多久，八里台的校舍建筑完工了，大学搬到那里。乘马车天天来回八里台是太辛苦了，又费时间。我请求父亲让我住校，也成功了。但每周末非回家不可，马车来接，马车送回。

八里台真有点象世外桃源，有乡村景色，有庙会，有小河，河边高高的芦草，河中可以划船，可以捉蟹。校址有宽大的马路，洋式的建筑。文科是一座大楼，理科是一座大楼，图书馆又是一座大楼。还有大礼堂，教师宿舍，男生宿舍，女生宿舍。女生宿舍有招待室，餐室，有一位女学监，一